

略论明清徽商参与文化事业的人文意义

杨世铁,周生杰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明清时期,徽商在经营成功之时,秉承“贾而好儒”之风,既创造了商业上的奇迹,亦打造了文化上的辉煌,成为古代儒商的典范。他们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不断满足公共文化的需求,资助文化名流成长,既提升了自己的文化素质,更给当今中国富豪成长提出诸多思考。

关键词:徽商; 公共文化; 人文意义

中图分类号: G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683(2012)06-0042-04

明清徽商财雄势大,成为各地商帮中的龙头和中坚力量,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徽商,并不仅仅做一个利益的追逐者、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贾竖子”,他们要向根深蒂固的传统“贱商”观念挑战,以商业上的成功为基础,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通过参与各种文化事业向士阶层攀附,争取以儒者面貌出现在社会舞台上。

—

在国家重大文化建设上,明清徽商表现出了极大的参与兴趣,这在《四库全书》的编纂和徽剧的发展上表现最为突出。

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四库馆开,各地私人进献书籍者共有97家^[1],而徽商在私家献书活动中表现尤著。献书超过500种的共有4家,即扬州马裕、杭城鲍士恭、汪启淑及宁波范氏后人,而前三家皆为徽商或其后人。其中,扬州二马(祁门人)的后人马裕一家献书776种,从献书数量来说当数第一;而时寓居杭州的鲍士恭(歙县人,鲍廷博之子)献书700余种,“大半宋元旧板旧写本,又手自校讎,一无伪讹,故为天下献书之冠”^[2]。《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清廷先后缮写7部,藏于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渊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称为“北四阁”。此后缮写的3部分别储藏于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的文

澜阁,称为“南三阁”。徽商在扬州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的建设和管理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清廷雇人抄写二阁图书时,他们通过两淮盐政伊龄阿向清廷奏请愿意承担全部费用,另一方面二阁修筑所需费用都是他们出资,且在两阁修好后,徽商继续出资,将装潢皮架等事一一办妥。几在同时,鲍廷博因为献书受到清廷赏赐后,为“戴君恩”^[3]而散尽家财,刊刻《知不足斋丛书》,又兴建赐书堂精心保护《古今图书集成》。太平天国运动中杭州文澜阁遭受到毁坏,图书散佚严重,鲍廷博的后人鲍寅继承家风,将家藏这部图书进呈杭州官府,一直流传到今天。

在徽剧的发展过程中,徽商不断注进活力,最后奠定了徽剧在各剧种中的坚实地位。乾隆五十一年(1786),徽商江春(歙县人)为了迎接乾隆南巡,组织春台班,并聘请安庆名旦郝天秀到扬州演出,而扬州在当时又正是“雅部”与“花部”的集中地,诸腔纷呈,由于徽商的鼎力支持,徽剧压倒当地群芳,一时有了“安庆色艺最优,盖于本地乱弹(花部)”^[4]之美誉,清人钱泳在论及这一盛举时,对徽商的功劳不无赞美地说:“梨园演出,高宗南巡时为最盛,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5]乾隆五十五年(1790),在徽商的资助下,徽班进京,庆祝高宗八十寿辰,接着,春台班、和春班、四喜班亦相继进京。四大徽班进京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举,并从

收稿日期:2012-11-25

作者简介:杨世铁(1964-),男,河北沧州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周生杰(1968-),男,江苏邳州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博士。

而产生中国的国剧——京剧，这一切都是与徽商的支持分不开的。

二

明清徽商对公共文化建设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心，一方面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则是纯粹的公益性质。除参与重大文化建设外，徽商对关系后代培养的教育文化事业更为关注，参与热情始终不减。

徽州的家塾、族塾、义塾、义学等遍布城乡各地，这些大多是徽商出资兴建的，目的是为宗族和邑里贫困子弟提供接受儒学教育的机会。康熙《徽州府志》载，清初徽州六县共有书院 54 所，其中歙县 14 所、休宁 11 所、婺源 12 所、祁门 4 所、黟县 5 所、绩溪 8 所，到道光间，徽州的书院总数达 60 余所。徽州书院数量的增加与徽商们的慷慨解囊分不开的，史载“歙在山谷中，垦田盖寡，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学之地自府、县学外，多聚于书院。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商之地海外无所不至，以业盐于两淮者为著，其大较者。……大之郡邑，小之乡曲，非学，俗何以成；非财，人何以聚。既立之师，则必葺其舍宇，具其菑粮，及夫释菜之祭，束脩之礼，是不可以力耕得之也”^[6]。道光《徽州府志》记载，乾嘉数十年间，徽商为修复歙县的山间书院和紫阳书院，共捐输银计七万余两，其中两淮总商鲍肯园两次独捐银一万一千两，纪昀《鲍肯园先生小传》称其“功在名教”^[7]。歙县另一位大盐商鲍淑芳父子在兴建家乡府学上捐资更多，嘉庆十二年（1807）鲍淑芳重修徽州府学，用去白银一万四千余两；嘉庆十六年（1811）其子鲍均捐资重修府学尊经阁及教授、训导两衙署。经过盐商们的捐资助学，明清两代，“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6]。

明清徽商多在江浙等地经营，而尤以居住在扬州为多，他们为家乡的塾学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亦对所在地的学宫、书院等出资兴建或维修。扬州两淮、敬亭、维扬、广陵、虹桥等书院，仪征的乐仪书院，淮安的丽正书院，除开支由盐政拨付外，徽州盐商的资助成为几处书院得以持续的主要经济来源。如马曰瑄于雍正十二年（1734）助建梅花书院，筑讲堂 5 间、号社 64 间。乾隆间侨居扬州的徽商汪应庚在乾隆元年（1736）见扬州江甘学宫“岁久倾颓，出五万金为重建，辉煌伦奐，焕然维新。又以二千金制祭祀乐器，无不周到，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8]。由于经费充足，待遇优厚，知名学者纷纷前来讲学，在徽州盐商

的重金招募下，任掌院者先后有王步青、姚鼎、厉鹗、赵冀、杭世骏、全祖望、蒋士铨、王乔林等显赫一时的学者，一时间名师执教，高徒辈出，兼之在院生徒膏火丰厚，为同时其他书院所莫及。

徽商一方面通过兴建各种塾学的方式培养后人，积淀文化，另一方面则为子弟的科举事业谋划。在明代的科举制度中，凡参加科举考试都应在本郡应试。徽商中的大多数人从事流动性的职业，长年居于外地，子弟如需参加科考，必须返回原籍应试，这就带来了诸多不便。明万历年间，曾任两浙巡盐御史的泾县人叶永盛奏请商人子弟应于所在州县占籍而与试，于是“歙之程、汪、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9]。“商籍”的设立，“其意义在于盐商及其子弟可不必返回原贯，以本籍报考科举，而在营业地就获得学额和科考资格”^[10]。资料统计，明洪武四年至崇祯十六年（1371—1643）三百七十多年间，两淮盐商中出进士 106 人，举人 133 人；清顺治三年至嘉庆七年（1646—1802）近一百六十年间，两淮盐商中产生了 139 名进士，208 名举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世居淮扬的徽商后人^[11]。

三

经商致富的徽商，既有矜饰风雅之辈，也有饱学之士，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量，以及对于文化的追求，他们十分愿意结交社会上的文化名流，为各界名流的成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徽商们的主要做法有：

第一，接济生活。旧时的文化名流，未显达时多家境贫寒，如果得到了及时的接济，便会继续从事文化事业，终有成就，而如果得不到他人的资助，则会就此沦落，一蹶不振。徽商拥有大量的家资，他们对于文化的热爱使之对那些需要帮助的文化人毫不吝啬，优待有加。扬州二马最为代表。二马兄弟好诗文，富藏书，建小玲珑山馆接延各地名流，一时间诗坛领袖袁枚、词坛领袖厉鹗、史界泰斗全祖望、经学家杭世骏、书法家蒋蓄、画家汪士慎等皆常住在小玲珑山馆，主人供给食宿，任他们读书。郑燮早年到焦山躲债，被马曰瑄发现，把他请到家中，优礼有加。郑燮在此读书，不久中举人，接着中进士。总商江春对于文化名流的资助堪与二马兄弟比肩，他建有康山草堂和江园，热心邀约著名文人方贞观、吴献可、叶天赐、金兆燕、陈撰、许滨等来此长住。乾隆三十七年（1772），江春又筑秋声馆，邀蒋士铨来住，蒋据白居易《琵琶行》改编成《四弦歌》，一唱而红，并扩而成为北京各戏班常演节目。其他徽商亦

是各尽所能,诚邀文化名流,如黄履退“有十间房花园,延苏医叶天士于其家,一时座中如王晋三、杨天池、黄瑞云诸人,考订药性,于倚山旁开青芝堂药铺,城中疾病赖之。刻《圣济总录》,又为天士刻《叶氏指南》一书”^[12]。

第二,借阅书籍。徽商重儒好学,多兴建私家藏书楼,扬州二马之小玲珑山馆、江氏兄弟(江春、江昉)的紫玲珑阁、程氏(程梦星、程晋芳,歙县人)的篠园、漪园,郑侠如(歙县人)的休园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中藏大量珍贵典籍。徽商大量藏书,为前来的文化名流提供了很多的阅读方便,使他们能够借阅到重要的典籍。清代扬州学派大学者凌廷堪常去马氏小玲珑山馆读书,并与程晋芳等交往频繁,先后得到了他们的许多帮助。扬州学派的主将阮元为江春的甥孙,年幼时常到江春的紫玲珑阁读书,在向多位徽商借阅之后,阮元终于撰写出《积古斋钟鼎彝文款识》这样的巨著。该书所著录的器物多达560件,并以此“辨识疑文,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有可补经传所未备者”^[13]。鲍廷博家有知不足斋,后建赐书堂,藏书十万余卷,他秉承“以散为聚”的藏书思想,无偿借阅。好友吴长元称赞说:“(鲍廷博)每得异书,不自珍锢枕函帐秘,往往播往艺林,公诸同好。”^[14]由于知不足斋藏书影响极大,加上获赠朝廷的一部《古今图书集成》,故一些不认识的学者为了能够借阅到鲍氏藏书,不惜辗转相托。但有陌生学者来访,鲍氏总是热情接待,将自己的藏书无偿提供阅读、抄写。黄廷鉴曾说:“月霄张子,辑《金源文》有年,虽广搜金石之遗,旁采道、释之藏,终以未读鲍氏赐书为恨。娄东张明楷椒卿……为之介绍,许假馆乌镇,次第借读。月霄欣然,遂于己卯闰月,买舟招余同往。值主人有事吴门未归,属小阮听香秀才为之主,居停于镇之南官道院,日自斋中载五六百册分编披读。……凡六日而毕。”^[15]

第三,举办集会。徽商还通过举办集会的形式,资助文化名流。清人李斗记载:“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邀至一厅甚旧,有绿琉璃四。又选老乐工四人至,均没齿秃发,约八九十岁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间令启屏门,门启则后二进皆楼,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

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12]卷八 180-181}这种集吟诗、听曲、品茶、饮酒诸乐趣的诗文之会,自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参加者甚众。清代徽商举办的文化名流集会中,最著名的有虹桥修楔、曲江文会和韩江诗社,其中韩江诗社的举办者为二马兄弟。马氏小玲珑山馆与陕商张士科、徽商陆钟辉为邻,“二马”便邀张、陆共建韩江诗社,社址设在张、陆各居其半的让圃中。参与活动、今知其名者有厉鹗、陈章、杭世骏等百余人,得诗词数千首,订为十二册。乾隆七年(1761)试灯前一日小玲珑山馆雅会,扬州八怪之一高翔赋《怀人诗》120首并高声朗诵,汪士慎、马曰璐等数十人随之唱和。乾隆八年(1762)冬,高翔、汪士慎在小玲珑山馆同绘《梅花帐》巨制,陈章、闾华、方士庶、马曰瑄为此同赋《梅花纸帐歌》。汪玉枢邀请36位诗人集于南园,各赋七古一首,编为《城南兼集诗》一册。

第四,刊刻文集。徽商的文化修养极高,他们往往涉足于当时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他们与文化名流的交往中,全方位地为他们服务,不惜花费巨资刊刻学者们的著述。关于徽商乐意刻书之举,近人许承尧称颂为“多刊善本,公诸海内,使承学之士,得所观摩”^[16],通过收藏、校勘,然后刻印行世,传播儒家思想。

鲍廷博在刊刻《知不足斋丛书》时,收录了大量清代朴学家校勘过的书籍,有卢文校勘的《两汉刊误补遗》(宋吴仁杰撰)10卷、何焯校勘的《猗觉寮杂记》(宋朱翌撰)2卷、吴长元校勘的《洛阳搢绅旧闻记》(宋张齐贤撰)5卷、厉鹗校勘的《蜕岩词》(元张翥撰)2卷,等等。

马氏兄弟既有广博的学识,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不仅富于藏书,而且精于刻书。他们慎选良工,把所藏的善本书籍、金石拓片择要刻印,以广流传。其刻书速度之快、雕工之精、版式之美,均属上乘,所刻许氏《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书,谓之“马板”。为了繁荣学术文化,马氏兄弟不仅重雕古书,而且不惜重金刊刻文化名流的著作,如朱彝尊的《经义考》300卷,完成后,由于篇幅过大,无人愿意承印,马氏不惜千金付梓。此外,王士禛的《感旧集》、戴震的《屈原赋注》、汪士慎的《巢林集》等书,都是由他们刊于扬州,得以流传的。

四

早在明代,汪道昆就把崇儒的商人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贾名而儒行者”谓之“儒贾”,以“儒饰贾者”谓之“贾儒”。^[17]前者指的是以经商为名而行儒家之道,后者是指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

实的。其实两者都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和经商才能的商人,亦儒亦商,士商结合。徽商大都能够辩证地处理“商”和“儒”的关系,他们二三百余年的商界驰骋、利润追逐过程中,逐渐累积了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思想素质,因之,这一商人群体,在商业经营中文化品位也比较高,成为蕴藏在“徽州文化”这座宝山中的一块瑰宝。

徽商通过参与公共文化,更好地创造和建设自身的商业文化,他们在经营活动中深切体会到,文化品位不同,经济效益迥异。一大批受过儒学教育的徽商子弟,因为种种原因未能中举入仕,于是子承父业,投入商界,成为有文化的徽商,他们熟悉儒家的待人接物之道,了解商人的兴衰成败之理,故能精于筹算,审时度势,把生意越做越活,许多人甚至成为众商依赖的智囊。明万历时,歙县的两淮盐商吴彦先,有暇辄浏览史书,以博学精思而获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必奉其筹划,他“权货物之轻重,揣四方之缓急,察天时之消长,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而出贾者利必倍”^[18]。又如扬州二马之盐,包装精美,播誉江淮盐市;他们印制图书,选题得当,校刻精审,形成“马版”风格,海内争相购阅。许多徽商大量收购字画、图书等文化产品,从自身利益考虑,必须具备鉴别、欣赏能力。而修筑园林,则须具有审美能力、规划管理能力,这就逼着商人读书,了解经、史、子、集,通晓艺术、诗文,并贯穿到经营活动之中。他们构筑了儒商伦理道德基础,培养成诚信不欺、公平守信的商德和高超的经营水平,从经营方略、经营核算到产品包装、广告宣传,都显得高于一般商人,加速了资金积累的步伐。

时下的中国盛产亿万富豪,这是不争的事实,凤凰卫视2011年3月10日报道,最新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有名的中国亿万富豪已达115人,占全球1200名富豪总数的1/10,跻身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远远超过日、法、德三国之总和。照此趋势,中国发展成为全球富豪第一大国将指日可待、毫无悬念。在上个世纪,“美国历史富豪榜”的头把交椅颁给洛克菲勒时,《福布斯》给出了这样的评语:“他不单单影响经济,还直接确定了这个国家的走向。”由此,我们亦发出同样的疑问: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中国富人们又影响了什么?他们又准备要影响什么?在发达国家有一个衡量富豪的不成文准则:就是他们可以拥有极多的财产,但必须有所回馈,而且必须有人注意到,否则这样的富豪就永远不会成为真

正的大人物。反观中国,富豪们习惯将成功穿在身上,但却不习惯将自己的财富以数字的形式写在富豪榜上,更不愿意为了慈善而出现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酒桌上。

出现在中国富豪身上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人们在批判中国新兴富裕阶层的时候,习惯于将他们横向地与西方的富豪相比,而事实上,纵向来看,明清时期徽商在处理经营和慈善、商业和文化、利益和道德时有更多的可取之处,他们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上的做法或许更能引起当今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豪们的深思。

参考文献:

- [1]黄爱平.四库全书编纂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35-37.
- [2]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百四十一[M]//清代传记资料:第184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252.
- [3]朱文藻.知不足斋丛书[M]//知不足斋丛书:第一集.上海古书流通处民国十年(1921)影印本.
- [4]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7:76.
- [5]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9:332.
- [6]马步蟾,等.道光徽州府志:卷三[M].道光七年(1827)刻本.
- [7]鲍琮.(歙县)棠越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二十一[M].嘉庆十年(1805)刻本.
- [8]汪舸.(歙县)汪氏谱乘·光禄少卿汪公事实[M].乾隆间钞本.
- [9]张海鹏.明清徽商资料选编[G].合肥:黄山书社,1985:109.
- [10]许敏.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J].中国史研究,1998(3).
- [11]王成.明清时期徽商对扬州文化发展的贡献[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5).
- [12]李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3]阮元.肇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374.
- [14]吴长元.斜川集序[M]//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六集.上海古书流通处民国十年(1921)影印本.
- [15]黄廷鉴.读知不足斋赐书图记[M]//第六弦溪文钞:卷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36.
- [16]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九[M]//鲍涑饮刊《知不足斋丛书》.合肥:黄山书社,2001:308.
- [17]汪道涵.太函集:卷五十二[M].合肥:黄山书社,2004:610.
- [18]吴吉祜.丰南志:卷五[M]//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刘正花